

今年5月,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八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获得“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泰利奖电视系列片历史类金奖。今年8月,该片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0年度国产纪录片及创作人才扶持项目评选中,又获年度优秀系列片、优秀国际传播、优秀导演三项荣誉。由该片主创团队创作的图书《亚太战争审判全纪实》即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计划在“九一八”九十周年之际首发。我们在此刊发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为《亚太战争审判全纪实》所撰序言,讲述纪录片拍摄的幕后故事,分享他的感悟。

——编者

《亚太战争审判》的幕后

■程兆奇

这本《亚太战争审判全纪实》是八集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的一个副产品。

《亚太战争审判》去年9月初在上海东方、纪实、外语三个频道播出后,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还记得第一集刚刚播完,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之女梅小倪在群中即用了“震撼”两字表示观后感。小倪先生作为长期关注东京审判研究的行家,她的第一感具有指标的意义。战后亚太地区对日本战犯有二类审判,广义的“亚太战争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的所有审判。狭义的“亚太战争审判”是指东京审判以外的审判。再细分还可分为与东京审判大体同时、属于盟军系统的BC级审判,以及不属于盟军系统的新中国与前苏联审判。《亚太战争审判》包括了东京审判以外的所有审判。

影片《亚太战争审判》的影碟出版时,出版社希望我写一个荐辞,我写下了语:

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第一次以影像的形式全景式展示了同盟国在亚太地区对日本军队战争暴行的审判。摄制组克服了地域辽阔、时间久远、特别是研究成果不足等种种困难,从繁华的都市到荒僻的远乡,从大陆腹地到太平洋的孤岛,遍访硕果仅存的亲历事件的当事人以及知情人和相关学者,以平和、理性、同时富有情感的态度和眼光,十分难能可贵地重塑了那一股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这是一部普通观众、专家学者都值得观看的不可多得的好片。

这是去年4月初在电视台审片时留下的深刻印象。今天翻开采访记,对此片的构想和拍摄的不易,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深感陈亦楠她们的努力以及拍摄过程本身,也很有分享给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的价值。

《亚太战争审判》是纪录片《东京审判》第三季的一部分。在介绍本书之前,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东京审判》的缘起。2015年,正值抗战胜利70周年,当时不少媒体都在筹划70周年的专辑。亦楠和陈冰等四位姑娘正是在那时来到了我们在剑桥路租借的办公室。说实在,最初是消极的。消极的理由当然和荒诞夸张的神剧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大多数相关作品的高亢声调,让人感到很难再有理性表达的空间。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来参谋,一是希望你们当作可传

的作品来认真做,而不是仅仅为了70周年应个景;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以平和的语调、说理的方式而不是慷慨激昂的高调来表现。特地记下这一幕,是因为在那样的纪念氛围中把一个带有宣传目的的作品调子压低十分不易,而亦楠她们对分寸的拿捏恰到好处。第一季后来在新加坡获得亚洲电视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我想和它的以理服人的特色有很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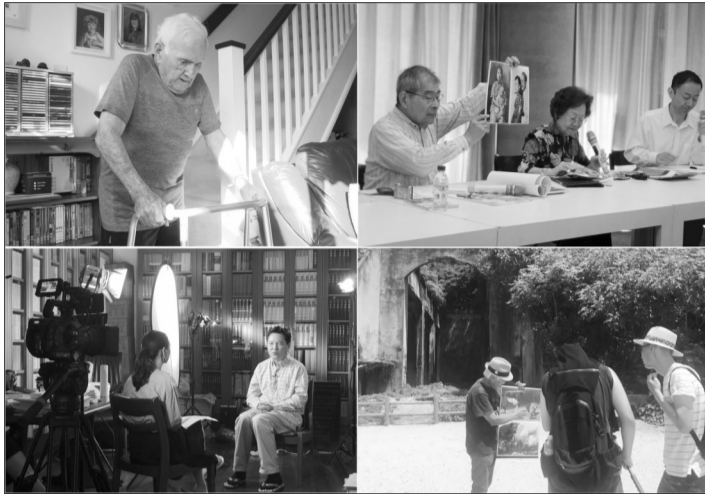
第二、第三季的拍摄是一个意外。第一季播出的下一年5月,中宣部对外新闻局胡凯红局长带队来我们研究中心调研,在撰写著作、书展推广、组织会议等建议外,凯红局长还提出可否拍一部纪录片。当从陪同考察的市外宣办主任徐威处得知,亦楠她们已拍摄过一部相当成功的纪录片时,当场确定由亦楠她们续拍一部新片。不久,我们(纪录片负责人来晓茜、亦楠和我)赴京向中宣部汇报计划,同时慎重提出,考虑到东京审判纪录片中外都曾拍摄,而其他审判几乎从未受到关注,因此希望能拍一部包括整个亚太地区审判的全景式纪录片。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宣部组织的专家组的认可。

第二季因有第一季的成功经验,加上“东京审判”已有的研究广泛而深入,拍摄过程还算顺利。影片播放后,得到不少观众好评的同时,还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等一系列奖项,称得上既叫好又叫座。

第三季的总名虽仍是《东京审判》,其中的《亚太战争审判》其实是单独析出的全新片子。有了《东京审判》前两季的基础,《亚太战争审判》的拍摄组已是十分成熟的团队。但“亚太战争审判”的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心来说,只是在几个点上刚刚起步,设计总体框架、确定基本方向,还可有一助,但具体内容,尤其是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对研究者来说也较为陌生领域的纪录片制作,我们也无从措手。所以,中心成员以及顾若鹏教授等不少学者虽然挂名顾问,但纪录片取得的成就,主要还是靠亦楠团队自己的努力。

第二集《活着回家》导演王静雯手记开头这样说:

按下邮件发送键,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祈祷:千万要看到,千万要回来,千万要答应我!其实这样的场景在此之前已经重复了很多次,这是我为找到“里斯本丸”事件的相关采访人物在一个星期内发表的12封邮件,而之前的11封要么



从左顺时针排列依次为:在英国采访里斯本丸最后的幸存者;高岛伸欣所组织的肃清大屠杀听证会现场,摄于新加坡;在大久野岛采访日本毒气研究专家山内正之;摄制组采访程兆奇先生

石沉大海,要么被婉拒。

两天后的2019年1月20日晚上10点38分,我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回复,这封回信来自里斯本丸研究专家、英国退伍少校布莱恩·费恩祺先生。布莱恩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他的回复令我十分振奋……

看到这一段我心想,一周内连发12封信,这要多大的耐心和坚忍啊!静雯的“振奋”,让人感同身受。如果不是这样锲而不舍,就不可能抢救到今天来为里斯本丸现身说法的最好人选——里斯本丸的唯一幸存者、百岁老人丹尼斯·莫利。

与其他题材的准备和拍摄可以从容不迫,按部就班不同,本片的摄制组是在和时间赛跑。丹尼斯·莫利先生今年1月3日去世了,摄制组有幸而抓住了最后的机会。而“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在世的唯一目击者东野利夫,自1979年出版《污名:九州大学活体解剖事件真相》以来,长年为解明真相不懈努力,本来相会应该不难,但第三集《生死飞越》的导演王芳虽经努力,仍因东野先生病体不便而失之交臂。(东野先生今年4月13日去世了)

除了争分夺秒,选材也很费周思。因为不仅要兼顾代表性和可能性,也要考虑适合纪录片的形象表现。诸如此类,都不是单纯框架设计和现有资料便可“顺理成章”完成的。所以,此片的成功,最重要的是每位导演各尽所能,都发挥了很大的能动性。第四集《魂断异乡》的内容是澳大利亚审判。按原来的设想,无外乎是在澳大利亚档案馆拍些档案,找几位当地专家,最好再能

有几位当事人的后人,以此串成一集。但导演俞浩在阅读相关文献中注意到,当时在拉包儿服役过的中国军民中居然有五十七名“八百壮士”。这一发现,激发了她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于是她去了我们所有人都十分陌生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始了她所说的“职业生涯中最曲折离奇的一次”拍摄:

这个热带国家至今没有高速公路,土路上大坑连着小坑,到处是茂密的热带丛林,还有各种蚊蝇,拍摄途中摄制组还差点遭遇打劫。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很难想象,七十多年前战士们是怎样挺过那三年的。

跟着俞浩的镜头,我们不仅看到了静卧在水下的飞机残骸,战士们修建的蜿蜒的坑道等等真正原生态的战时遗迹,从集中营走出来、以后两任巴新总理的华裔老人陈仲民的讲述,更让人切实体会到了现代侵略战争的危害“无远弗届”——再远的偏乡也成不了免疫的避风港!

与同盟国组织的东京审判不同,各国对日战犯审判追究的主要是战争暴行,因此反映日军暴行是本片的主题之一。迄今为止全景式反映东京审判以外的亚太地区审判的纪录片,本片是唯一一部,但反映日军暴行的纪录片俯拾皆是。如果说本片与许许多多揭露暴行的纪录片有所不同,除了紧扣审判对象的角度,主要是平和与理性。第五集《万劫难归》集中反映了英军审判中有关日军在香港和星洲迫害华人的罪行,其中不少罪行令人发指。如

罗荣基老人眼中噙着泪花讲述的让他们“含泪过生活”的父亲被害往事,沈素非老人回顾的少时父亲被残杀、母亲也因伤痛而死的悲痛经历。但这些本来很容易燃起观众敌愆心的故事,在本片中并没有转化为仇恨和怨愤。本集导演朱雯佳记录在新加坡参加沈素非老人的跨国听证会的感受时甚至用了“温情”两字。我想受佳特别记下的“温情”,当非随笔,这是比理性更为难能可贵的境界。

文献的不足是拍摄本片需要克服的基本困难之一。本片拍摄之际,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的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档案汇编尚在进行途中,所以与东南亚的各集同样,我们未能给予第六集《绳之以法》以有效的帮助。但国民政府审判的概貌,特别是精神,通过戴诚娟导演的努力,还是很好地传达给了观众。

通过上海军事法庭第二任庭长李良的女儿李家璠之口我们知道,李法官对待审判的态度是“务使每一案件,勿枉勿纵,绝无遗憾”。诚娟的体会是:审判之所以没有一任性情,而是“克制”“民族感情”,是因为心中有着“司法正义”。这很好地解答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中,论受害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程度之甚,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提并论,但战后亚洲地区的七国八府对日本战犯审判,中国无论在有罪比例上还是重罪比例上,反而显得最为宽大?其中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所谓“以德报怨”等大方针的影响,还不如说是日军在中国的犯罪由于地域辽阔、时间久远、特别是迁徙频繁,造成了战后审判取证困难,而中国法官坚守着“勿枉勿纵”的“司法正义”,因而有以致之。这是中国审判最了不起之处。(也可取日本右翼所谓“胜利的审判”,相关问题我在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中文版序言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我一直觉得,如果心中还有天下苍生,战争没有赢家;第七集《良知救赎》导演散雪说,拍摄战争审判给她的最大感受就是“在战争中,每个人都都是受害者”,她因此将这句话作为本集最后的旁白。这种不约而同,并不是谁谁具只眼,而是这种感受最符合所谓“人之常情”。本集中“北平惨案”的幸存者李庆祥老人,时隔八十年,心中的苦痛仍未抚平,至今回忆起未能从日军施放毒气的地道中逃离的妹妹时,仍不禁落泪。受害者如此,只要天良未泯,

“加害者”亦复如此。本集另一主要受访者、日本大久野岛毒气工厂的工人藤本安马,从法的角度,罪不至他头上,但他坚持良心立场,认为自己参与了制造杀人毒气,即是有罪。为此还曾专程来到北平村谢罪,得到庆祥老人“你们也是被迫的,你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的诚恳谅解。在世的毒气工厂员工中,唯有藤本老人痛悔战时经历,而藤本和同事,战后都三缄其口。但无论他们有无反省,取何种立场,不少人都因中毒而长久为病痛缠绕。据藤本先生回忆,当年制造毒气时,甚至有人当场中毒身亡。从这一点上说,的确“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在战后审判中,新中国审判是最为特殊的一场审判。与一般审判以惩罚罪犯为目的不同,新中国审判实行的是“改造”,目的是实现战犯的转变,这是很好传达给了观众。随着相关文献和当事人回忆等的公开,我们已大致了解新中国审判确有策略性考虑,但能让昔日的罪犯心悦诚服认罪,而且这种“觉悟”在释放回日后终生不变,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第八集《人性召魂》的导演宣福荣将他的手记题为“一场开创未来的战争审判”。我不知道小宣所说的“未来”仅是指让这些战犯获得重生,还是指可以作为未来审判的示范。我觉得新中国审判是在特定条件下、与普通审判形似实异的一场实验。虽然它在有罪比例上还是重罪比例上,反而显得最为宽大?其中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所谓“以德报怨”等大方针的影响,还不如说是日军在中国的犯罪由于地域辽阔、时间久远、特别是迁徙频繁,造成了战后审判取证的困难,而中国法官坚守着“勿枉勿纵”的“司法正义”,因而有以致之。这是中国审判最了不起之处。(也可取日本右翼所谓“胜利的审判”,相关问题我在顾若鹏《日本战争罪行与中国审判》中文版序言中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

本书发稿前夕,传来了《亚太战争审判》荣膺“美国电视界奥斯卡奖”的第42届泰利奖(The Telly Awards)电视系列片历史类金奖的喜悦。作为一部“中国”印记明显的电视作品,得到西方世界最重要的电视大奖,说明亦楠她们通过艰辛努力取得的成绩有公认的价值,值得祝贺。最后,我想援引亦楠在手记结尾的朴素愿望作为这篇序言的结尾:

二战的硝烟虽然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真相不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模糊,每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生命都应该卑微地逝去。它们也在时刻警示着世人要珍视和平,不要重蹈历史覆辙。

东大殿与书

■孟向荣

毕晓明在2020年第3期《老警官》发表文章《淳亲王府那些事儿》,全面地介绍了坐落于公安部大院内的淳亲王府。其中提到衙门后面的银安殿。我在这座官殿里与书香相伴了十四年,但我们俗称其为“东大殿”,从毕先生的文章中也(以下简称毕文)才知道它的本名。以下说一我在这座官殿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与其相关的故事。

出版社资料室大本营

我是1979年2月到东大殿报到的。当时群众出版社隶属于公安部办公厅的正处级单位,资料室是社属科级单位,办公地址和藏书主体就在东大殿。它叫个“资料室”,但整个公安部的知情干部,都首先认可它,因为它的藏书远比公安部图书馆丰富,以致一些分配到那里工作的青年干部,当发现了东大殿这块图书宝地之后,先是惊奇,后就不再去公安部图书馆借书了。

群众出版社资料室的藏书在整个在京出版社资料室的藏书都是名列前茅的(不论册数,至少从种类上如此)。古籍的收藏,或许仅次于中华书局。1979年,为了编修《中国善本书总目》,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专家们,有不少来到群众出版社搜集情况,他们也因这家资料室的藏书而受到学术滋养。直到晚年一些时候,有人说《醇亲王载沣日记》尚存于世,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错!该日记在群

众出版社。原文献找不着了,仅存一份抄件,就在东大殿!

东大殿的藏书涵盖了《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所有类别。具体来讲,尤以中国传统文史类图书以及相关研究著作多,政治法律类图书(包括民国旧警政)亦不少。要讲书之花絮,试举两例。《金瓶梅》非洁本,就在东大殿的一个书柜里锁着,我都没见过。记得,1979年有一位在办公厅供职的长相清秀且文质彬彬的年轻女干部,到我这里借阅中华书局版《孟子》和人民出版社版德热拉斯著《新阶级》。按旧日说法,这两本书,一本是封建主义的,一本是“文化大革命”前限定一定行政级别才能阅读的修字“灰皮书”。可见,改革开放之初,坚冰难久,禁忌已经打开了。

当时资料室的负责人黄敏做选书的工作,他的父亲黄肃秋先生和母亲张秀莹女士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建时期的老人,其父还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故黄敏较为熟悉出版界的行道以及各出版社的中国传统文史类的新书与研究新著。我与他一起到书店选过书。懂行的人都知道,版本目录之学见工夫,选书之学则反映出选家的视野和水平,亦博采版本目录之学。一家有特色的资料室,全看藏家选择收取什么书。就拿我们这个资料室来说,大凡古典文史方面形形色色的大型工具书,有代表性的总集别集诗文评、晚出的辑佚、校注、集说、论辩、史述

等等研究作品,典雅古朴、美不胜收。热衷于古代学问的读者,在东大殿走走书架,是十分开心的事。

东大殿使用面积约五百平方米。其东北角开辟了卫生间,被同事戏称“百味斋”。西北角是一间能摆下床的小休息室。整体建筑貌似雄伟,其实已经外强中干了。记得,有关部门对它进行了一次修缮,凿开外墙,里面支撑大殿的一些木柱子已经被虫蛀去了一半,而大大瘦身。看来,任何时候都要提防潜在的危险。

高级访客及邻居

东大殿的访客遍布公安部各个业务局,但比起公共图书馆来,依然是十分冷清的。因为没有系统、繁琐的借阅功能,使得资料室的工作稍有轻闲之处。但任何时候也不能拒绝群众出版社内部的同志,这是它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单位搬到方庄之前,历任群众出版社的领导都到这里来借借过书。譬如,一位资深社领导曾来借阅周作人的集子,都是贴着牛皮纸封套的民国时期出版物。其时,周作人研究热刚刚兴起。还有编辑人员带着作者到这里来借书的。譬如,有一位文编室的编辑带来了小说《神圣的使命》的作者王亚平。这是一位比我年纪还要轻的帅哥。

我说的高级访客指的是部级以上干部。

王芳同志来东大殿借过书。

1980年,他还是浙江省的副省长,到北京参加审两案的工作。毕文说的“府门”,即审两案的办公地点,与我们这个资料室只隔一块绿地。记得,他与秘书一块来的,他在书架里踱步巡视,有时抽出一本书浏览或翻阅页码,呈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最后填条借书了。若干年后,他到公安部担任领导时,我听人讲他喜欢阅读中国传统文史类图书,但想不起来他当时借了什么书。

王文副副部长在1989年夏天来东大殿借过严家其的《首脑论》,大抵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用。司法部的蔡诚也是资料室的常客。有一次他借书逾期,我到六号楼他的家中催还,没有见到他,是否我跟他家保姆说话生硬了?导致事后他跑到资料室问,是谁催他还书了。我说:“是我。”他就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说起邻居,多费几口口舌。毕文说,银安殿的东翼楼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用于干部住房。在这里居住过的有解衡、胡之光、佟静秋、王学音。我的印象是上世纪60年代慕丰韵、解衡就在这里住了。慕、解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扫地出门,公安部恢复正常后,慕丰韵搬到原尹肇之家;解衡搬回原住处,后公安部的部长楼盖好,他又搬了过去。胡之光没有在东翼楼住过。东翼楼的两套房子,慕丰韵面积大,解衡家面积小。上世纪70年代后期,李广祥从广东调回部里上班,住

在面积大的那套房子。再后来,李广祥的房子佟静秋住,解衡的房子王学音住。毕文所述银安殿东北角的16号楼,凌云一直住到本世纪初。

与东大殿配套的几个地点

银安殿藏书再多,也容不下群众出版社资料室所有藏书。从1979年我上班后,还去过五个该资料室的藏书地点。

1.公安部14号楼。这是一座十分破旧的洋楼。我在这里整理过《万有文库》和《国学基本丛书》。

2.公安部12号楼。曾收存资料室所藏民国期刊。修缮后该楼成为司局级干部宿舍。

3.中央政法干校图书馆二层。收藏群众出版社最有价值的古籍和字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立后,校方请我们搬离了此地。

4.秦城监狱。原12号楼和中央政法干校图书馆的藏品以及东大殿淘汰下来的图书都曾寄居这里。

说到秦城监狱这个配套藏书地点,不妨啰嗦若干:此监地盘大,照顾群众出版社,辟出一些暂时废弃的监舍,供资料室装书。多数是“文化大革命”前用《人民大学图书分类法》编目的图书。记得,盛夏三伏天,在通风设施不太好的监舍,资料室工作人员挥汗如雨,男同志有的光着上身,穿泳裤衩运送上架排序,晚上不能回市里,买点葡萄、蛋清汤在那里盯着……为何最后还是离开秦城监狱了呢?披露一个小

秘密:著名电影演员刘庆庆住进了我们藏书的监舍。

5.八里庄北京市公安局服装仓库。原秦城监狱的藏书又搬迁至此。

说到市局这个服装仓库,再补充一些内容。笔者手头有一个完整的曾经放置于此的藏书目录。这个目录所列就版形式讲,有明清刻本、抄本,有民国石印本、铅活字本,还有少许共和国时期的影印本。就内容讲,以地方府志、私人日记、古籍书目题跋与古代公安学著作多。尤其是清代刑幕大家的作品,琳琅满目,颇富研究价值。其中值得一书的冷门出版物是当代戏剧评论家、掌故佚闻家徐凌霄(笔名“凌霄汉阁”)的著作《记程》。徐氏民国初年成名,亦为京剧高级票友。笔者疑此书与程砚秋的艺术生涯,因为他们关系密切,一起唱过《打渔杀家》等戏。《记程》当为群众出版社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从琉璃厂买回的民国图书。选书者的眼光似乎盯上的是书海中的隔行之类,其实,公安部是有文保部门的,资料室收藏这类图书,恰印证了老一辈出版人为公安服务的藏书视野。

1993年春天,东大殿的藏书“流浪”到方庄。2010年方庄的藏书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服装仓库的藏书又钻进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团河校区的地下车库,从此封闭起来,不再对外借阅。至于2010年以后的藏书故事,我就不太清楚了。